

縱此類密醫，可以說是在無政府狀態。

由日本學成歸國時之雄心壯志，隨即幻滅。在故鄉開業行醫，既已不值得考慮，我就開始計劃離家到大都市，碰運氣、求機會。

戰後的台北市，在西門町中華路有一省屬公共衛生機關叫台灣省台北保健館，經過介紹，我在那裡找到了一份工作。門診部位於新世界電影院的側對面，至於主要工作內容，則是在門診部診療病人以及學童之口腔衛生工作等。

這份工作讓我與台北地方的牙科界有了接觸，認識在民國40年代的牙科界領導人物，這些人物包括：台大醫院的牙科醫師、市立台北醫院薛嘉祥醫師、在中華路開業之大陸華西大學畢業的周少吾醫師、在東門開業的林服業醫師等。在彼此談話中，我開始瞭解首都台北市與故鄉彰化牙醫界的環境相差無幾。

談起此時的國家社會情況，正是戰後最不安定期，國共內戰後，國民黨中央政府遷移台北，社會每一角落充滿著凋零、一蹶不振之氣氛。我所交往的這些台灣牙科界老前輩的臉上可明顯看出，這個非常年代的無朝氣、虛脫、生活的疲勞。偶有牙醫的集會裡，大家所談的並非在醫術方面，而是“サンプル冠（不鏽金屬冠）一顆，你向病人收了多少錢？”等類與生活最迫切的話題。

此時期，國民政府只顧反攻大陸與戰備，已無餘力顧及內政。在牙科醫政方面，可說採取放縱政策，放縱政策導致混亂。只要知道牙科治療的皮毛，此人就可以無懼地處理別人的牙齒，這種無執照的人俗稱“モグリ (Moguri)”，他們開